

资产减值动态、稳健性原则与盈余后果*

曾雪云 叶康涛

[摘要]本文对1998~2006年间资产减值政策的盈余后果进行了系统评估,深入考察了稳健性原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冲突。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在稳健主义原则下的资产减值动态呈现出“双曲波浪”特征,增强了盈余波动性,存在盈余管理动机;虽然,也反映了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但对行业经济条件的反映是不稳健的,并且与公司层面的经营状况变动是相悖的。这说明稳健性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不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等流动资产减值的占比相当高,与“大清洗”、“盈余平滑”、“扭亏”、“微利”动机具有显著相关性,这表明新准则对于减值操纵的抑制作用仍然有限。

关键词: 资本市场监管 稳健性原则 资产减值动态 盈余管理 盈余波动性

JEL 分类号: D23 G30 M41

一、引言

我国的资产减值政策先后经历了三次重要变更。第一次政策变更是在1998年12月,财政部颁布《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要求国内企业自1999年起对应收账款、存货、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等四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计提方法和计提比例自行确定,鼓励上市公司在1998年自愿计提。第二次政策变更是在2000年,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制度》,要求从2001年开始对委托贷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等四项资产进行期末减值测试和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且当资产的市场价值回升时,允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第三次政策变更是在2006年,财政部颁布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从2007年开始不得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这三个时点的政策涵义在于,稳健性原则在1998年被正式应用,在2000年前后得到了进一步重视,而2007年禁止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则标志着准则制定者对稳健主义与自由裁量权的冲突有了新的权衡^①。针对减值政策的变迁,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是对1998~2006年的资产减值行为及盈余后果展开系统总结。

由于稳健主义的概念原则是要求“尽可能地预估损失和尽可能少确认收益”(LaFond and Watts, 2008),这导致经理层在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方面存在大量自由裁量权,惯常通过超额计提和转回从正反两个方向调节会计利润,以此规避证监会对股票特别处理和退市监管的规定(王建新, 2007a; 王建新, 2007b; 戴德明等, 2005; 薛爽等, 2006; Chen et al., 2004; Chen et al., 2009),进而导致了经理层的违逆行为和投资者估值困难。但现有研究主要是以长期资产减值作为分析对象(王建新, 2007a; 王建新, 2007b; 张然等, 2007; 于李胜, 2007; 谭燕, 2008; 宋衍蘅和何玉润, 2008),而对资产减值长期趋势、单项资产减值和流动资产减值的研究却相当不够。因此,到目前为止,对稳健性原则下的减值操纵问题始终缺乏一个系统、全面地认识,特别是新《企业会计准则》关于禁

* 曾雪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管理学博士。叶康涛,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本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1M50019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132004, 71072145)的资助。当然,作者文责自负。

① 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动机存在显著相关性(戴德明等, 2005; 赵春光, 2006; 薛爽等, 2006; 王建新, 2007a; 王建新, 2007b; 代冰彬等, 2007; 于李胜, 2007; 谭燕, 2008; 宋衍蘅和何玉润, 2008; Chen et al., 2009)。

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能否遏制减值操纵行为的效力还不十分清晰。

鉴于此,本文拟从资产减值动态的视角重点考察以下研究问题:1998~2006年间,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在时间趋势上有怎样的动态特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报告盈余?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哪些单项资产的减值和转回具有重要性?这些动态趋势及其盈余后果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稳健主义原则导向下的资产减值政策盈余后果展开系统评估,可以深入考察稳健性原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冲突,能够为加强新会计准则下减值行为的监管和规范提供参考。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通过分项目分层级的计量分析,我们得到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在动态趋势上呈现出“双曲波浪”特征,显著增强了盈余波动性,实证检验显示受到了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2)虽然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也反映了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但对行业经济条件的反映是不稳健的,并且与公司层面经营状况的变动是相悖的;(3)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等流动资产减值占八项减值的比例相当高,进一步分析显示与“大清洗”、“盈余平滑”、“扭亏”、“微利”动机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表明新准则虽然禁止了长期资产减值的转回,但对于有意利用减值操纵行为的限制作用仍然有限。本文对1998~2006年资产减值政策的盈余后果进行了系统评估,对我国上市公司在稳健性原则下的资产减值动态、盈余后果及行为动因进行了解释,揭示了稳健性原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冲突,深化了资本市场监管方面的研究。

后文第二部分重点分析资产减值动态、政策过渡期的减值行为、单项资产减值、减值前后的盈余波动性与盈余反转,以及对资产减值的盈余后果展开系统评估,第三部分对资产减值及其盈余后果做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对资产减值动态及盈余后果的系统评估

(一)样本选择与度量方法

本文的资产减值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由于样本区间较长,披露方法有变更,因此整合1998~2006年全部资产减值数据的工作量比较大。第一步,先用CSMAR数据库中单项资产减值的期末余额减去期初余额,以计算1998~2002年资产减值准备的发生数。第二步,取CSMAR数据库2003~2006年“会计报表附注”中资产减值准备发生数,进行归类整理后得到记录值21829条,应用Reshape方程将Long数据转换为Wide数据结构。第三步,合并1998~2006年的全部资产减值数据,共得到9867个公司-年,剔除金融行业和审计报告为否定意见或无法发表意见的公司-年,最终得到9512个有效观测值。

对资产减值的度量与定义。(1)IMP代表“资产减值净发生数” $IMP_{it}=|WD_{it}-RES_{it}|$,等于公司*i*在*t*年的单项资产减值计提总额减去转回总额的绝对值;当公司*i*在*t*年的资产减值计提大于减值转回时,定义为“资产减值净计提”,记为 IMP_{WD} ,有6544个公司-年归入 IMP_{WD} ,占总数的68.8%;当公司*i*第*t*年的减值计提小于减值转回时,定义为“资产减值净转回”,记为 IMP_{RES} ,有2968个公司-年归入 IMP_{RES} ,占总数的31.2%。(2)IMPA代表“资产减值净发生数占期初总资产的比率”, $IMPA_{it}=|WD_{it}-RES_{it}|/ASSETS_{i0}$, $IMPA_{WD}$ 代表“资产减值净计提比例”, $IMPA_{RES}$ 代表“资产减值净转回比例”。(3)IMPE代表“资产减值净发生数与减值前净盈余的比率”, $IMPE_{it}=|WD_{it}-RES_{it}|/NI_{Bt}$,其中 NI_B 代表“资产减值前的净盈余”, $NI_{Bt}=NI_{it}+WD_{it}-RES_{it}$;当 $NI_B>0$ 时,用 $IMPE_{BE}$ 代表“资产减值净发生数与减值前净利润的比率”;当 $NI_B<0$ 时,用 $IMPE_{BL}$ 代表“资产减值净发生数与减值前净亏损的比率”。

(二)资产减值动态分析

1.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净额始终比较大,占总资产的比率比较高,对会计盈余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表 1 对 1998~2006 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总体规模进行了描述。其中:(1)在绝对水平上,资产减值净计提额 IMP_{WD} 的均值是 2490 万元,中位数是 710 万元;资产减值净转回额 IMP_{RES} 的均值是 1680 万元,中位数是 500 万元。(2)在相对水平上,资产减值净计提比例 $IMPA_{WD}$ 的均值是 1.69%,中位数是 0.54%;资产减值净转回比例 $IMPA_{RES}$ 的均值是 1.42%,中位数是 0.36%。(3)就资产减值与减值前盈余之比来说, IMP_{WD} 组内“资产减值净额与减值前净利润的比率” $IMPE_{BE}$ 的中位数是 10.33%，“资产减值净额与减值前净亏损的比率” $IMPE_{BL}$ 的中位数是 52.50%; IMP_{RES} 组内 $IMPE_{BE}$ 的中位数是 16.59%, $IMPE_{BL}$ 的中位数是 127.30%。这个总体描述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发生额相当大,占总资产的比率比较高^①,对会计盈余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表 1 我国上市公司 1998~2006 年的资产减值分布特征

分析项目	资产减值净计提				资产减值净转回			
	1/4 位数	中值	均值	3/4 位数	1/4 位数	中值	均值	3/4 位数
资产减值净额(IMP 百万元)	2.1	7.1	24.9	23	17	5	16.8	1.3
资产减值净占资产总额的比率($IMPA$)(%)	0.17	0.54	1.69	1.64	1.23	0.36	1.42	0.10
资产减值净额与减值前净利润的比率($IMPE_{BE}$)(%)	0.00	10.33	25.39	535.70	0.00	16.59	41.18	535.70
资产减值净额与减值前净亏损的比率($IMPE_{BL}$)(%)	715.20	52.50	136.50	0.04	715.20	127.30	190.30	0.00

注:(1)为了减轻对盈余管理动机的高估,本文选用资产减值净计提和净转回比例,即对每个公司一年的资产减值提取与转回进行抵消之后的净发生额。(2)以上变量已经按 1%进行 Winsorization 极值处理。

表 2 报告了资产减值的分类结果和分布频数。本文借鉴 Elliott and Hanna(1996)以及 Riedl(2004)对“大清洗”的定义,取 $IMPA$ 四分位数的近似值对资产减值进行分类^②。表 2 显示出以下主要特征:(1)在 1998 年自愿计提的情况下,有 65.3%的公司都只计提了“小额资产减值”,仅有 11.2%的公司计提“超大资产减值”;(2)在 1999 年强制性计提的情况下,有 63.0%的公司都计提了“超大资产减值”;(3)在 1998~2006 年,共有 60.2%的公司一年计提和转回了“大额资产减值”和“超大资产减值”,并且在各个年度的分布是均衡的。这不同于 Elliott and Hanna(1996)对美国上市公司的描述:即 1956~1994 年间有大额资产减值的公司比例经历了从 5%到 21%的缓慢攀升过程。

2.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呈现“双曲波浪”特征,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的比例是高低相间和交错互逆的,减值净计提比例较高的年度正好对应了较低的减值转回比例。

图 1 绘制了 1998~2006 年的 $IMPA_{WD}$ 和 $IMPA_{RES}$ 均值曲线,在时间趋势上显示了三个动态特征。(1) $IMPA_{WD}$ 和 $IMPA_{RES}$ 均值趋势线有“双曲波浪”特征,两者的高低变化呈现逆向互转现象,上

① 分行业来看,出版业的资产减值准备提取和转回比例最高,资产减值净提取占总资产比率的均值是 2.49%,资产减值净转回占总资产的均值是 2.29%,其次是农林渔业、房地产、通信业、综合业和建筑业;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行业的减值净提取比例的均值都是 1.06%,资产减值准备净转回比例的均值分别是 0.62%和 0.56%。

② Elliott and Hanna(1996)将非经常性损益大于资产总额的 1%定义为“大清洗”,依这个比率我国上市公司在 1998~2006 年有 34.7%的公司一年归入“大清洗”。Riedl(2004)依减值前盈余变动的大小对全部样本公司进行排序,将正值中位数以外的取值定义为“盈余平滑”,将负值中位数以外的取值定义为“大清洗”。本文的定义是:先按资产减值净发生数的相对和绝对规模对资产减值进行分类,然后通过分析资产减值是否带来盈余后果,以此鉴别“大额资产减值”和“超大资产减值”是否确有盈余后果。区别在于,本文侧重于解释资产减值的盈余后果,而既往文献侧重于解释盈余管理动机。

表 2 1998~2006 年的减值分类和分年频数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总体	占比(%)
小额资产减值	394	22	87	107	98	136	155	168	163	1330	14.00
一般资产减值	89	89	188	308	301	388	382	362	356	2463	25.90
大额资产减值	52	186	246	306	334	354	370	359	406	2613	27.50
超大资产减值	67	505	377	350	361	294	368	387	397	3106	32.70
总体	602	802	898	1071	1094	1172	1275	1276	1322	9512	100

注：资产减值的分类标准如下：(1)当 $IMPA$ 小于 0.1%，或者 IMP 小于 100 万元时，定义为“小额资产减值”；(2)当 $IMPA$ 位于 [0.1%, 0.5%)，或者 IMP 位于 [100 万元, 500 万元) 时，定义为“一般资产减值”；(3)当 $IMPA$ 位于 [0.5%, 1.5%)，或者 IMP 位于 [500 万元, 2000 万元) 时，定义为“大额资产减值”；(4)当 $IMPA$ 达到 1.5%，或者 IMP 达到 2000 万元时，定义为“超大资产减值”；(5)将资产减值净发生数列作为分类标准，是因为如果不考虑资产减值数额则容易忽略大公司的重大资产减值计提；例如，中国石化 (600028) 2002 年的资产减值计提是 11.8 亿元，虽然只占总资产的 0.32%，但对会计盈余的影响比较大。

年高、则下年低，上年低、则下年高；并且 $IMPA_{WD}$ 较高的年度正好有较低的 $IMPA_{RES}$ ， $IMPA_{WD}$ 较低的年度正好有较高的 $IMPA_{RES}$ 。(2)“资产减值计提比例”($IMPA_{WD}$)的峰值是 3.3%，位于 1999 年；而 1998 年的 $IMPA_{WD}$ 只有 0.58%，由于年报资料已经剔除会计政策变更的累计影响数^①，因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在自愿性计提下存在提取不足，而在强制性计提下却表现为大量提取。(3)“资产减值转回比例”($IMPA_{RES}$)的峰值是 0.94%，位于 2006 年，相当于 2005 年减值转回比例 (0.68%) 的 1.38 倍，并且 2006 年的 $IMPA_{WD}$ 均值是 1.4% 并且显著低于 2005 年 (1.7%)，这个分析表明 2006 年资产减值转回是相对集中和大额的。

(三) 资产减值动态对盈余波动性的影响

图 2 对减值前后的净资产收益率进行比较。在不考虑 1998 和 1999 年初始计提的异常情况下，就 2000~2006 年来说，“减值前的净资产收益率”(ROE_B)的均值线在 2%~4% 之间波动，而上市公司对外报告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均值线则在 0~6% 之间波动。由此可见，对外报告的净资产收益率波动幅度显著大于减值前的净资产收益率波动，表明资产减值行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盈余波动性。

表 3 报告了资产减值前后的盈余波动性。我们用 1998~2006 年 ROE_B 和 ROE 的标准差来代表盈余波动性， $SD(ROE_B)$ 代表样本公司减值前盈余波动性， $SD(ROE)$ 代表样本公司报告盈余的波动性。表 3 显示“减值前盈余波动性”($SD(ROE_B)$)比“报告盈余的波动性”($SD(ROE)$)大的公司有 832 家，占到了总体的 61%，说明资产减值的变动增强了多数上市公司的盈余波动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两者的均值差异，表 3 显示“报告盈余的波动性”($SD(ROE)$)的均值是 1.05，“减值前盈余波动性”($SD(ROE_B)$)的均值是 0.20，其均值差异在 1% 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资产减值变动在长期趋势上对盈余波动性的增强作用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因此，资产减值导致了更大的盈余波动性是对“双曲波浪”特征的一个解释。按稳健性原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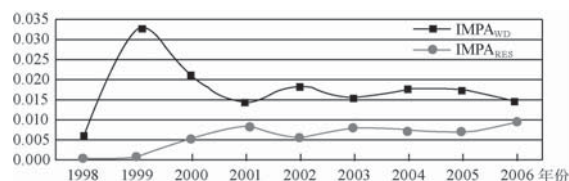


图 1 资产减值的动态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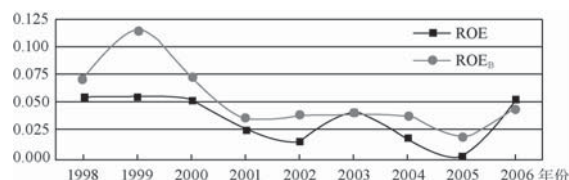


图 2 减值前后的盈余波动性

^① 根据财政部财会字 (1999) 35 号文、49 号文有关规定，对资产减值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1999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经发生的资产减值调整 1999 年期初数，1999 年当年的资产减值才计入当期损益。根据财会字 (2000) 25 号文和 (2001) 17 号文，四类需要进行减值估计的资产在 2001 年之前的减值追溯调整 2001 年的期初数，2001 年当年的资产减值才计入当期损益。所以，本文采用资产减值期末余额减期初余额，是已经剔除了这两次政策调整累计影响数的。

表 3 减值前后的盈余波动性

分析组	公司数	Mean[SD(ROE)]	Mean[SD(ROE _B)]	均值差异	T 值
SD(ROE)>SD(ROE _B)	832	1.05	0.20	0.85***	3.73
SD(ROE)<SD(ROE _B)	533	0.13	0.82	-0.69***	-2.59
总体	1365	0.71	0.44	-0.27	1.22

注:* 表示 10%水平下显著,** 表示 5%水平下显著,*** 表示 1%水平下显著。

要求,对以经济动因为基础的资产减值特别是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判断应当以未来的盈利能力为基础,需要管理层在企业经营状况较好的情况下就能够预见未来可能的资产损失,以避免这些损失在实际发生时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因此资产减值计提或转回应当有利于减轻盈余波动性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与此相反,本文的分析显示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使得盈余波动性显著增加,这表明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可能是以盈余操纵为主要动因的,在这种情况下资产减值会降低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报告的盈余质量,并且不利于分析师和投资者对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做出合理评估。

(四)资产减值的盈余后果

基于已有文献对盈余管理动机的解释^①,资产减值的盈余后果主要有规避亏损、规避 ST、扭亏、配股达标以及实现高亏损反转和高盈利反转这六项^②。其中,规避或解除 ST 特别处理,配股达标目标是与证券监管制度相关^③,本文称为第一类盈余后果;“大清洗”、“盈余平滑”以及“正向盈余管理”是在不同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称为第二类盈余后果。我们通过表 4 对这两类盈余后果进行总体测评,具体的测算指标和定义标准见表注。在表 4 中,黑体加粗的部分被定义为资产减值的盈余后果^④,其涵义是该项资产减值对当年的财务报告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在扣除

表 4 资产减值行为与报告盈余的相关性(单位:公司-年)

项目	亏损公司	连续两年亏损的公司	高亏损公司	扭亏公司	配股达标	高盈利公司
减值计入盈余之前	1562	388	781	407	2362	3975
减:减值之后减少数	517	153	322	34	480	346
加:减值之后增加数	133	76	87(减值前连续三年亏损)	130	255	105
减值计入盈余之后	1178	398	589	628	1987	4167

注:(1)对高亏损的界定:以 ASSETS₀ 对 NIB 做平减,当排位于负值中位数之下时界定为减值前高亏损;再以 ASSETS₀ 对 NI 做平减,当排位于负值中位数之下时界定为减值后高亏损。(2)对连续两年亏损的界定:本年亏损并且上年亏损。(3)对扭亏的界定:本年盈利上年亏损。(4)对配股达标公司的界定:按照证监会对 ROE 的计算要求,取 ROE 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ROE 的较低者,2000 年按累计 ROE 大于 30%并且单年 ROE 不低于 6%计算达标线,2001~2004 年按累计 ROE 大于 18%计算配股达标线;并且,资产减值制度始于 1998 年,资产减值转回从 2005 年被列入非经常性损益,所以本文只需要分析 2000~2004 年间的配股达标情况。(5)对高盈利的界定:以 ASSETS₀ 对 NI_B 做平减,当排位于正值中位数之上时界定为减值前高盈利;再以 ASSETS₀ 对 NI 做平减,当排位于正值中位数之上时界定为减值后高盈利。

① 对国内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盈余管理的研究有:戴德明等(2005);王跃堂等(2005);赵春光(2006);薛爽等(2006);王建新(2007a,2007b);代冰彬等(2007);张然等(2007);于李胜,2007;谭燕,2008;宋衍衡和何玉润,2008;Chen et al.(2009);Zhang et al.(2010)。国外对资产减值盈余管理的研究有:Strong and Meyer(1987);Elliott and Shaw(1988);Zucca and Campbell(1992);Francis et al.(1996);Rees et al.(1996);Elliott and Hanna(1996);Riedl(2004)等。

② “高亏损反转”指利用减值计提实现高亏损或者利用减值转回避免高亏损的行为。“高盈利反转”指利用减值计提避免高盈利或者利用减值转回实现高盈利的行为。

③ 证监会到 2004 年才要求将减值转回计入非经常性损益,这之前进行减值转回仍有助于配股目标实现。

④ 本文以是否导致盈余后果的实质性改变定义资产减值的盈余后果。比如,从减值提取前高盈利变为减值提取后非高盈利,从减值转回前亏损变为减值转回后盈利。这个研究设计由于侧重于解释盈余后果,因而有利于减轻对资产减值盈余管理动机的人为高估。从结果来看,我们对盈余管理后果的取值结果显著小于 Elliott and Hanna(1996)和 Riedl(2004)对“大清洗”的定义域。

重复计数后,一共得到 2059 个存在盈余后果的公司-年,占到了上市公司总体的 21.4%,说明资产减值对报告盈余存在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分析结果如下:

1.在证监会的 ST 特别监管制度的约束下,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转回行为在规避亏损等阈值管理行为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表 4 显示,共有 517 个有潜在亏损的公司-年通过减值转回实现了盈利,占减值转回前亏损公司-年(1562)的 33%;有 153 个公司-年通过减值转回规避了连续两年亏损,占减值转回前连续亏损公司-年(388)的 39%;有 87 个公司-年通过减值转回规避了连续三年及以上亏损,占减值转回前连续亏损公司-年(388)的 22%;有 255 个公司-年通过减值转回实现了扭亏,占扭亏公司(628)的 41%。针对“规避亏损”动机,通过表 5 对连续亏损公司做了进一步分析。表 5 显示,如果不允许采用资产减值转回,将新增 308 家连续三年以上亏损公司。这个数字是巨潮咨询网公告的被实行 PT 或终止上市的公司数(59 家)的 5 倍。其中,有 120 家公司将连续四年亏损,46 家公司将连续五年亏损,15 家公司将连续六年亏损,4 家公司将连续七年亏损。这 4 家公司分别是:“ST 中华”、“ST 轻骑”、“东安黑豹”和“中茵股份”。

表 5 转回资产减值准备之前连续三的以上亏损的公司(单位:家)

项目	若没有减值转回,将新增连续三年亏损公司	若没有减值转回,将新增连续四年亏损公司	若没有减值转回,将新增连续五年亏损公司	若没有减值转回,将新增连续六年亏损公司	若没有减值转回,将新增连续七年亏损公司	合计
观测数	123	120	46	15	4	308

注:若公司 i 属于连续五年亏损,则不计入连续四年亏损;若公司 j 属于连续四年亏损,则不计入连续三年亏损;依次类推。

2.资产减值政策减少了配股达标线的公司数。在表 4 中,依“减值前净盈余”(NI_B)计算,有 2362 个公司-年达到配股线,依“减值后净盈余”(NI)计算,有 1987 个公司-年达到配股线,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较少采用资产减值转回迎合配股要求。

3.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高亏损规避行为和高盈利报告倾向,即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当 NI_B<0 时,利用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平滑”比“大清洗”行为更为常见:在“减值前高亏损”的公司中,有 322 个公司-年通过减值转回避免了高额亏损(见表 4);而在“减值后高亏损”的公司中,只有 130 个公司-年通过减值计提实现了高额亏损。当 NI_B>0 时,利用减值转回高报业绩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相当显著:在“减值后高盈利”的公司中,有 538 个公司-年属于“减值前非高盈利”(见表 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有相当普遍的高盈利报告倾向;而在“减值前高盈利”的公司中,只有 346 个公司-年报告了减值提取之后的非高盈利。

表 6 资产减值规模与盈余后果的相关性

分析项目	盈亏反转		配股达标		高亏损		高盈利		(扣除重数)总计	
	公司数	占比(%)	公司数	占比(%)	公司数	占比(%)	公司数	占比(%)	公司数	占比(%)
小额资产减值	5	0.50	1	1.00	11	2.40	89	10.10	74	3.60
一般资产减值	58	6.00	19	18.10	27	6.00	171	19.30	281	13.60
大额资产减值	151	15.70	27	25.70	48	10.60	144	16.30	377	18.30
超大资产减值	750	77.80	58	55.20	366	81.00	480	54.30	1327	64.40
合计	964	100	105	100	452	100	884	100	2059	100

注:“配股达标”反转公司是指在减值转回后达到配股线的 105 个公司-年。

表 6 显示,就 2059 个存在盈余后果的公司-年来说,一共有 64.4%的盈余后果是受到了资产减值提取或转回额达到 2000 万元或者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 1.5%的“超大资产减值”的影响,并且有 77.8%的亏损规避行为是与这些“超大资产减值”转回直接相关的。表 6 说明在减值净提取或净

转回额占到总资产的 1.5% 或者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情况下会导致会计盈余的实质性改变。

(五) 对单项资产减值做分析

表 7 单项资产减值对盈余后果的影响(单位: %)

Panel A 各单项资产值在资产减值总额中的占比

分析项目(百分比)	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短期投资跌价	长期投资减值	固定资产减值	无形资产减值
大额资产减值组						
净计提	58.70	1.80	15.40	8.60	15.00	0.60
净转回	32.30	12.00	28.00	8.90	16.60	2.30
超大资产减值组						
净计提	54.70	2.00	14.10	10.30	17.20	1.70
净转回	49.10	3.00	24.50	8.50	12.60	2.20

注: (1) 本表数据已按 1% 做 Winsorization 极值处理。(2) 在 9512 个观测值中, 没有委托贷款减值和在建工程减值发生; (3) 以上单项资产减值的成分比是依均值比例做标准化处理之后的结果, 合计数等于 100%。

Panel B 各单项资产减值占该类资产期初余额的比例

分析项目(IMPA')	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短期投资跌价	长期投资减值	固定资产减值	无形资产减值
大额资产减值组						
净计提	3.79	5.72	2.45	6.59	1.82	1.72
净转回	3.19	30.58	3.62	10.98	1.72	19.16
超大资产减值组						
净计提	9.78	53.58	8.12	18.91	8.75	54.15
净转回	10.27	40.09	12.21	29.18	4.61	67.62

注: (1) 本表数据已按 1% 做 Winsorization 极值处理。(2) 对 $IMPA'_{WD}$ 和 $IMPA'_{RES}$ 的计算, 以该单项资产的期初余额进行平减。

表 7 对各单项资产减值进行了分析。Panel A 报告了存在盈余后果的观测值的单项资产减值的成分比, Panel B 报告了单项资产减值的净计提比例和净转回比例, 分析结果显示流动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是导致盈余后果的重要解释因素并且对报告盈余具有决定性影响。先以存在“超大资产减值”的公司为例, Panel A 显示坏账准备净计提额占八类资产减值净计提的比率是 54.7%, 坏账准备净转回额占八项资产减值净转回的比例是 49.1%; 然后依次是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Panel B 显示坏账准备平均净计提比例是 9.78%, 坏账准备的平均净转回比例是 10.27%; 存货跌价准备的平均净计提比例是 53.58%, 存货跌价准备的平均净转回比例是 40.09%;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的净计提比例是 8.12%,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的净转回比例是 12.21%。从“大额资产减值”组来看, 流动资产减值对报告盈余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在 Panel A 中, 坏账准备净计提额的占比是 58.7%, 坏账准备净转回的占比是 32.3%; 在 Panel B 中, 存货跌价准备净转回比例是 30.58%, 说明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可能是上市公司的主要盈余操纵工具之一。所以, 虽然以往文献极少关注流动资产减值的重要性, 但本文的分析表明流动资产的减值计提与转回对盈余反转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而且应当作为新会计准则下减值监管的重点内容; 同时也说明新会计准则虽然禁止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 但是对于上市公司有意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限制力度仍然有限。

三、资产减值盈余后果动因的实证检验

(一) 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借鉴 Riedl(2004),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构建 Tobit 模型(1)和(2), 对资产减值盈余后果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Tobit 模型(1)用于解释资产减值计提的动因, 被解释变量是 $IMPA_{WD}$ 。Tobit 模型(2)用于解释资产减值转回的动因, 被解释变量是 $IMPA_{RES}$ 。 $IMPA_{WD}$ 有三个取值, 分别是: 资产减值计提比例 WD_{it} 、流动资产减值计提比例 $CURWD_{it}$ 、长期资产减值计提比例 $LONWD_{it}$ 。 $IMPA_{RES}$

也有三个取值,分别是:资产减值转回比例 RES_{it} 、流动资产减值转回比例 $CURRE_{it}$ 、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比例 $LONRES_{it}$ 。对 $IMPA_{WD}$ 和 $IMPA_{RES}$ 的定义遵照惯例,用资产总额的期初数进行平减,不抵消资产减值提取与转回额。

$$IMPA_{WDit} = \alpha + \beta_1 \Delta GDP_{it} + \beta_2 \Delta INDROA_{it} + \beta_3 \Delta INDROP_{it} + \beta_4 \Delta ROS_{Bit} + \beta_5 \Delta ROE_{Bit} + \lambda_1 BATH_{it} + \lambda_2 SMOOTH_{it} + \gamma_1 MGT_{it} + \gamma_2 FST_{it} + \gamma_3 ESR_{it} + \gamma_4 DUAL_{it} + \gamma_5 DIR_{it} + \gamma_6 SIZE_{it} + \gamma_7 LEV_{it} + \varepsilon \quad (1)$$

$$IMPA_{RESit} = \alpha + \beta_1 \Delta GDP_{it} + \beta_2 \Delta INDROA_{it} + \beta_3 \Delta INDROP_{it} + \beta_4 \Delta ROS_{Bit} + \beta_5 \Delta ROE_{Bit} + \lambda_1 NK_{it} + \lambda_2 SP_{it} + \gamma_1 MGT_{it} + \gamma_2 FST_{it} + \gamma_3 ESR_{it} + \gamma_4 DUAL_{it} + \gamma_5 DIR_{it} + \gamma_6 SIZE_{it} + \gamma_7 LEV_{it} + \varepsilon \quad (2)$$

经济动因:采用 ΔGDP_{it} 表示宏观经济的影响, $\Delta INDROA_{it}$ 以及 $\Delta INDROP_{it}$ 代表行业层面的经济因素, ΔROS_{Bit} 和 ΔROE_{Bit} 代表公司层面的经济因素。当宏观经济和行业景气度下滑或者公司的经济盈余下降时,资产的市场价值很可能下降,进而导致减值比例的增加,因此 ΔGDP_{it} 、 $\Delta INDROA_{it}$ 、 $\Delta INDROP_{it}$ 、 ΔROS_{Bit} 以及 ΔROE_{Bit} 在模型(1)的预期符号为负。与此相反,当经济条件好转时,随着宏观经济、行业景气度上升以及公司经营状况的逆转,资产的市场价值可能回升,减值转回比例将增加,所以 ΔGDP_{it} 、 $\Delta INDROA_{it}$ 、 $\Delta INDROP_{it}$ 、 ΔROS_{Bit} 以及 ΔROE_{Bit} 在模型(2)的预期符号为正。

报告动因:在 Tobit 模型(1),借鉴 Riedl(2004),以 $BATH_{it}$ 、 $SMOOTH_{it}$ 作为报告动机。 $BATH_{it}$ 代表“大清洗”动机,若公司 i 在第 t 期的 ROE_{Bit} 排位于所有减值前净利润率负值的中位数之外,则 $BATH_{it}=1$;否则, $BATH_{it}=0$ 。 $SMOOTH_{it}$ 代表“盈余平滑”动机,若公司 i 在第 t 期的 ROE_{Bit} 排位于所有减值前净利润率正值的中位数之外,则 $SMOOTH_{it}=1$;否则, $SMOOTH_{it}=0$ 。 $BATH_{it}$ 的系数预期为负, $SMOOTH_{it}$ 的系数预期为正,表示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的资产减值提取比例更大。在 Tobit 模型(2),以 NK_{it} 和 SP_{it} 作为报告动机。 NK_{it} 代表“扭亏”动机,若公司 i 在第 $t-1$ 期报告了亏损且在第 t 期盈利, $NK_{it}=1$;否则, $NK_{it}=0$ 。 SP 表示“微利”,若公司 i 在第 t 期的 ROE_{it} 小于 1%且大于 0, $SP_{it}=1$;否则, $SP_{it}=0$ 。 NK_{it} 和 SP_{it} 的系数预期显著为正,表示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资产减值转回的比例更大。

公司治理: MGT_{it} 是高管层变更的指示变量,当高级管理层发生变更时, $MGT_{it}=1$;否则, $MGT_{it}=0$;鉴于 Francis et.al.(1996)等文献发现高管层变更时资产减值比例更大^①, MGT_{it} 系数符号预期为正。 FST_{it} 是国有控股公司的指示变量。如果是国有控股公司, $FST_{it}=1$;否则, $FST_{it}=0$ 。 ESR_{it} 等于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鉴于实行股权激励时公司治理的绩效将显著改善,预期 ESR_{it} 系数符号为负。 $DUAL_{it}$ 是指示变量,如果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DUAL_{it}=1$;否则, $DUAL_{it}=0$ 。当两职合一时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大,因此 $DUAL_{it}$ 的系数预期为正。 DIR_{it} 是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由于独立董事作为专业人士应当具有职业谨慎性,对违背会计准则的行为理应有识别能力和风险意识,以向董事会提示和减轻违规减值的行为。并且,现有文献也发现独立董事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叶康涛等,2007;叶康涛等,2011),所以 DIR_{it} 系数的预期符号为负。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SIZE_{it}$ 表示资产规模, LEV_{it} 表示财务风险。

(二)分组检验结果

表 8 将样本划分为“资产减值计提大于转回”、“资产减值转回大于计提”两类,每类分为“有盈余后果”和“无盈余后果”两个组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以解释经济因素和管理因素对减值盈余后果的重要性。由于剔除了公司治理变量的缺失值,表 8 的样本量是 8581 个观测值,其中 1961 个公司-年归属于“有盈余后果”,6620 个公司-年归属于“无盈余后果”。通过表 8,我们可以发现^②:

① 虽然 Elliott and Hanna(1996)和 Francis et.al.(1996)把 MGT 归入了盈余管理因素,但是 Winson(1996)认为 MGT 代表的是新任管理团队在公司战略调整过程中对企业资产价值的重估和调整,不宜解释为盈余管理动机。

② 对中值做 Kwallis 秩和检验,检验结果与均值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这部分检验结果可提供。

表 8 单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减值计提大于减值转回的公司				减值转回大于减值计提的公司			
	有盈余后果	无盈余后果	差异值	T 值	有盈余后果	无盈余后果	差异值	T 值
IMPA _{WD}	0.060	0.013	0.047***	(41.1)	0.008	0.003	0.005***	(10.0)
IMPA _{RES}	0.006	0.002	0.004***	(13.9)	0.041	0.007	0.034***	(29.8)
ΔGDP	11.88	12.43	-0.544***	(-4.40)	13.52	13.22	0.306***	(2.77)
ΔINDROA	-0.011	-0.009	-0.002***	(-2.97)	-0.008	-0.008	0.000	(0.60)
ΔINDROP	-0.341	-0.303	-0.039**	(-2.20)	-0.319	-0.314	-0.004	(-0.21)
ΔROS _B	-0.128	-0.023	-0.105***	(-6.52)	-0.015	-0.099	0.083***	(3.96)
ΔROE _B	-0.011	-0.001	-0.009	(1.24)	-0.003	-0.030	0.027***	(2.63)
BATH	-0.028	-0.010	-0.018***	(-12.4)				
SMOOTH	0.019	0.016	0.003*	(1.75)				
NK					0.275	0.058	0.217***	(17.1)
SP					0.131	0.036	0.095***	(9.49)
MGT	0.554	0.449	0.106***	(6.05)	0.407	0.532	-0.125***	(-6.38)
FST	0.736	0.771	-0.036**	(-2.40)	0.771	0.731	0.040**	(2.33)
ESR	0.003	0.007	-0.003**	(-2.01)	0.004	0.000	0.004***	(2.92)
DUAL	0.150	0.113	0.037***	(3.26)	0.099	0.123	-0.024**	(-1.94)
DIR	0.200	0.217	-0.017***	(-2.97)	0.262	0.243	0.019***	(3.25)
Obs.	976	4833			985	1787		

注：* 表示 10%水平下显著，** 表示 5%水平下显著，*** 表示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 t 值。

第一，在“资产减值计提大于转回”的情况下，当“有盈余后果”时，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经济（ΔGDP 均值是 11.88）、行业经济（ΔINDROA 均值是 -0.011、ΔINDROP 均值是 -0.341）和公司经营境况（ΔROS_B 均值是 -0.128）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低于其他的公司，说明资产减值盈余后果受到了经济动因的影响。同时，在“有盈余后果”的公司中，“大清洗”动机 BATH 的均值是 -0.028，在 1%水平上显著低于其他公司；“盈余平滑”动机 SMOOTH 均值是 0.019，在 10%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公司，这说明资产减值的盈余后果同时也受到了管理动因（即报告动机）的影响。

第二，在“资产减值转回大于计提”的情况下，当“有盈余后果”时，一方面，宏观经济代理变量 ΔGDP 的均值 13.52 在 1%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公司，表明资产减值转回反映了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行业经济因素 ΔINDROA 的均值为负 -0.008，公司层面经济因素 ΔROS_B 的均值为负 -0.015、ΔROE_B 的均值也为负 -0.003，表明所经历的行业景气度和公司经营境况仍然处于下降趋势和并无好转迹象；综合这两个方面，可见资产减值转回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反应是不一致和不稳定的。同时，在“有盈余后果”的公司中，“扭亏”动机的变量 NK 的均值是 0.275，在 1%水平上显著低于“有盈余后果”的公司（T=17.1），说明 27.5%的公司通过减值转回实现了扭亏；“微利”动机的变量 SP 的均值是 0.131，在 1%水平上显著低于“有盈余后果”的公司（T=9.49），表明 13.1%的公司属于减值转回后的微利，由此可见扭亏和微利动机对资产减值转回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就公司治理来说，在“资产减值计提大于转回”的情况下，表 9 显示在高级管理层发生变更（MGT=1）、或者董事长兼任总经理（DUAL=1）的情况下，资产减值计提导致盈余反转的概率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公司；就“有盈余后果”的公司来说，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在 1%水平上显著低于其他公司。在“资产减值转回大于计提”的情况下，是否导致盈余后果的两组公司在公司治理特征上也存在显著区别。

表 9 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动因做实证检验

变量名称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因变量=WD)		(因变量=CURWD)		(因变量=LONWD)	
CONSTANT	0.066***	(8.32)	0.034***	(7.96)	0.014***	(6.04)
ΔGDP	0.000	(0.86)	0.000	(0.86)	0.000	(0.13)
$\Delta INDROA$	-0.066***	(-3.20)	-0.025**	(-2.19)	-0.005	(-0.87)
$\Delta INDROP$	-0.001	(-0.99)	-0.001	(-1.25)	0.000	(0.00)
ΔROS_B	-0.004*	(-1.80)	0.000	(0.52)	-0.001	(-1.47)
ΔROE_B	-0.003	(-0.79)	-0.001	(-0.80)	-0.001	(-1.25)
BATH	-0.279***	(-11.1)	-0.140***	(-9.40)	-0.042***	(-6.16)
SMOOTH	0.209***	(9.17)	0.105***	(8.78)	0.049***	(7.90)
MGT	0.002***	(2.88)	0.001**	(2.48)	0.000**	(2.44)
FST	0.001*	(1.86)	0.001***	(3.10)	0.001***	(3.33)
ESR	-0.008	(-1.43)	-0.004*	(-1.77)	-0.004***	(-6.04)
DUAL	0.001	(1.22)	0.001**	(2.00)	0.000	(0.25)
DIR	0.001	(0.46)	0.007***	(4.06)	-0.004***	(-3.87)
SIZE	-0.004***	(-9.19)	-0.002***	(-8.52)	-0.001***	(-5.47)
LEV	0.022***	(10.6)	0.010***	(8.53)	0.002	(3.45)
Obs.	8581		8581		8581	
Log likelihood	14543.3		16086.2		6791.4	

注:*表示10%水平下显著,**表示5%水平下显著,***表示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t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9 报告了对资产减值计提动因的分析结果。回归模型是 Tobit 模型(1)。回归 1~3 的被解释变量依次是资产减值提取比例(WD)、流动资产减值提取比例(CURWD)、长期资产减值提取比例(LONWD)。表 9 显示了以下实证结果:(1)就经济动因来说,行业资产利润率变动($\Delta INDROA$)的系数跨越回归 1~3 依次为-0.066、-0.025 和-0.005,在 1%~10%水平上显著,说明行业景气度下降对资产减值提取存在显著影响;但是 ΔGDP 、 $\Delta INDROP$ 、 ΔROE_B 的系数跨越回归 1~3 都是不显著的,而且销售利润率(ΔROS_B)的系数也只在回归 1 才显著;这表明经济毁损因素与资产减值计提的相关性是比较弱的。(2)就报告动因来说,BATH 的系数跨越回归 1~3 依次是-0.279、-0.140 和-0.042,都在 1%水平上显著,显示出在减值计提前的经营亏损越大的情况下的资产减值计提比例越高;SMOOTH 的系数跨越回归 1~3 依次是 0.209、0.105 和 0.049,也都在 1%水平上显著,显示资产减值计提前的净利润率越高的情况下的减值计提比例越高;这个实证结果表明“大清洗”和“盈余平滑”的盈余管理动机对资产减值比例具有显著影响,与戴德明等(2005)等既有文献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3)就公司治理来说,高级管理层变更的代理变量 MGT 的系数跨越回归 1~3 在 1%~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管层变更的公司有更大的资产减值计提比例,这与 Francis et al.(1996)以及 Elliott and Hanna(1996)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此外,财务风险 LEV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示了负债水平越高的公司有高比例的资产减值计提,说明资产盈利能力显著下降,这与 Elliott and Hanna(1996)和 Riedl(2004)的结论是一致的。

表 10 报告了以 Tobit 模型(2)对资产减值转回动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回归 1~3 的被解释变量依次是资产减值转回比例 RES、流动资产减值转回比例 CURRES 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比例 LONRES。表 10 显示:(1) ΔGDP 的系数跨越回归 1~3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资产减值转回与宏观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说明资产减值转回反映了宏观经济条件的好转。(2) ΔROS_B 的系数在 1%水

表 10 对资产减值转回的动因做实证检验

变量名称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因变量=IMPA _{RES})		(因变量=CURREN)		(因变量=LONRES)	
CONSTANT	0.042***	(7.30)	0.007*	(1.88)	-0.010***	(-3.73)
Δ GDP	0.002***	-14.8	0.001***	(18.2)	0.001***	(5.16)
Δ INDROA	-0.012	(-0.81)	-0.014	(-1.40)	0.000	(-0.05)
Δ INDROP	0.001	(1.37)	0.001**	(2.47)	-0.000***	(-2.03)
Δ ROE _B	-0.007***	(-12.2)	-0.002***	(-4.70)	-0.001***	(-2.80)
Δ ROE _E	-0.012***	(-10.1)	-0.012***	(-13.7)	-0.005***	(-7.83)
NK	0.033***	(32.7)	0.019***	(27.8)	0.007***	(15.7)
SP	0.001*	(1.72)	0.002***	(6.31)	0.001***	(2.74)
MGT	0.002***	(3.58)	0.001***	(3.45)	0.000	(0.40)
FST	0.001	(0.82)	0.001*	(1.75)	0.001***	(2.93)
ESR	-0.019***	(-3.28)	-0.013***	(-3.22)	-0.011***	(-3.71)
DUAL	0.001	(1.39)	0.002***	(3.22)	0.000	(0.33)
DIR	0.007***	(3.00)	0.002	(1.02)	0.013***	(11.6)
SIZE	-0.003***	(-12.1)	-0.001***	(-7.26)	0.000	(-0.76)
LEV	0.008***	(15.9)	-0.004***	(-7.18)	-0.002***	(-4.07)
Obs.	8581		8581		8581	
Log likelihood	14133.5		14046.0		8625.4	

注: * 表示 10%水平下显著, ** 表示 5%水平下显著, *** 表示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 t 值。

平下显著为负 $([-0.007 \sim -0.001])$, 与预期相反; Δ ROE_B 的系数符号也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 $([-0.012 \sim -0.005])$, 表明经理层在盈利能力下降幅度较大的情况下转回了更大规模的资产减值准备; 并且, Δ INDROA 和 Δ INDROP 的估计系数与资产减值转回只有较弱的相关性, 因此不仅没有证据表明资产减值转回是行业层面和公司层面经济条件好转的结果, 相反却是管理层对抗外部和自身经济条件下滑的有用的管理工具。(3)NK 的系数跨越回归 1~3 介于 $[0.007 \sim 0.033]$ 且在 1%水平下显著, SP 的系数介于 $[0.001 \sim 0.002]$ 并且也在 10%水平下显著, 可见扭亏和微利动机与减值转回比例存在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上市公司在规避亏损动机的影响下转回了更大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综合这两个方面, 表 10 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转回虽然也受到了宏观经济条件的影响, 但与行业层面经济因素的相关性比较弱, 而且在公司层面主要是受到了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 说明减值转回很大程度上是上市公司用于应对经营状况恶化的管理工具。

综合表 9 和表 10, 可见“大清洗”、“盈余平滑”、“扭亏”和“微利”动机与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大小存在显著相关性, 这说明报告动机对资产减值比例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这个分析结果解释了减值动态趋势为何在均值水平表现为“双曲波浪”特征和盈余波动性的原因。由于“双曲波浪”和盈余波动性主要代表了大额资产减值的行为特征, 而大比例的减值计提和转回又主要是受到了报告动机的影响, 即管理层为了规避 ST 监管制度或者特定的盈余目标, 通过在前后会计期间展开大额减值计提和大额减值转回来对财务报告做正反两个方向的盈余调节, 先提取大额资产减值准备以储存利润或者释放损失, 再转回减值准备以实现盈利目标或者盈利增长目标。因此导致了减值计提与减值转回比例的高低交错和前后逆转的“双曲波浪”现象, 进而增强了盈余波动性。

(四)稳健性检验

我们进行了多个稳健性检验: (1) 分别以流动资产总额对流动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做平减, 以

长期资产总额对长期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做平减进行检验;(2)以资产减值的净计提比例和净转回比例测算减值大小进行检验。(3)以 Riedl (2004)的方法定义大清洗 BATH 和盈余平滑 SMOOTH,以净资产收益率介于 0~2%定义微利 SP 进行测试。以上补充检验的结果与报告结果是一致的,限于篇幅没有列表。此外,我们就公司治理对减值报告动因的影响做了进一步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独立董事规模增加情况下资产减值计提与盈余管理动因的相关性显著减弱,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高级管理层变更、国有控股公司情况下资产减值与报告目标的相关性显著增强。

四、结 论

稳健性原则下的减值操纵问题一直是业内的关注重点。以往研究已经解释长期资产减值行为的经济动因。在此基础上,本文首次整合了 1998~2006 年的全部资产减值数据,对这段重要历史时期资产减值政策下的盈余后果进行了系统评估。主要研究结论有:(1)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额始终较大,资产减值净提取额占总资产比例在平均水平上达到了 1.69%,资产减值净转回比例的平均水平是 1.42%;在动态趋势上呈现出“双曲波浪”特征,计提与转回比例的高低变化呈现逆向互转现象,即上年高、则下年低,上年低、则下年高;显著地增强了盈余波动性,有 61%的公司的报告盈余的波动性大于减值前的盈余波动性;实证结果显示主要是报告动机的影响所致。(2)资产减值与各类经济动因的相关性存在差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但对行业经济动因的反映是不稳健的,并且与公司层面经营状况的变动是相悖的。(3)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等流动资产减值在资产减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实证结果显示流动资产减值及其盈余后果与报告动机具有显著相关性,经理层在“大清洗”和“盈余平滑”动机的影响下计提了更高比例的流动资产减值,在“扭亏”和“微利”动机的影响下、在盈利能力下降越大的情况下转回了更高比例的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获得如下启示:(1)在稳健性原则下,资产减值作为重要的会计估计事项,事实上也是重要的管理工具,但除了盈余操纵这个原因,监管政策和会计理念的影响也值得关注。由于稳健主义的极端形式是尽可能地预计损失,而且现实条件下对稳健性原则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这为上市公司的过度减值和盈余储备提供了理由。加之对资产价值的估计通常涉及到行业特性和经营预期,使得注册会计师在价值判断方面存在实际困难。所以,减值操纵与会计估计、监管政策、理论基础、审计能力等多重因素是紧密相关的。例如,本文发现有 517 个潜在亏损的公司-年通过减值转回实现了盈利,有 153 个公司-年通过减值转回规避了连续两年亏损,有 255 个公司-年通过减值转回实现了扭亏,这说明 ST 监管规则是导致减值操纵的重要原因。(2)需要重视对流动资产减值的监管与规范。在 2007 年实施新会计准则后,稳健性原则的重要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市场化的公允价值理念。由于对原短期投资等金融资产采用了公允价值会计核算,因而金融资产的减值操纵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在资产减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和具有显著的报告动机,这就表明新准则虽然抑制了长期资产减值的转回,但对于有意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限制作用可能仍然较为有限。(3)治理重点可以放在遏制资产减值过度计提方面。加强对资产减值计提环节的监管,有助于从源头上限制减值操控行为,也有助于减轻更早期间对资产价值的人为高估。总而言之,本文的研究对资产减值动态、盈余后果及其操控性动因进行了解释,揭示了稳健性原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冲突,有助于深入、系统地认识资产减值政策的经济后果,对于进一步规范资产减值行为和加强监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代冰彬、陆正飞、张然(2007):《资产减值:稳健性还是盈余管理》,《会计研究》,第 12 期。
- 戴德明、毛新述、邓瑶(2005):《中国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研究》,《财经研究》,第 7 期。
- 罗进辉、万迪昉、李超(2010):《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来自 2004~2008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会计评论》,第 2 期。
- 宋衍蘅、何玉润(2008):《监管压力与审计市场竞争压力:注册会计师的权衡——以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为例》,《管理世界》,第 5 期。
- 谭燕(2008):《资产减值准备与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管制》,《管理世界》,第 11 期。
- 王建新(2007a):《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 3 期。
- 王建新(2007b):《公司治理结构、盈余管理动机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会计研究》,第 5 期。
- 王跃堂、周雪、张莉(2005):《长期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体现还是盈余管理行为》,《会计研究》,第 8 期。
- 薛爽、田立新、任帅(2006):《八项计提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第 2 期。
- 叶康涛、陆正飞、张志华(2007):《独立董事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经济研究》,第 4 期。
- 叶康涛、祝继高、陆正飞、张然(2011):《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基于董事会投票的证据》,《经济研究》,第 1 期。
- 于李胜(2007):《盈余管理动机、信息质量与政府监管》,《会计研究》,第 9 期。
- 张然、陆正飞、叶康涛(2007):《会计准则变迁与长期资产减值》,《管理世界》,第 8 期。
- 赵春光(2006):《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会计研究》,第 3 期。
- Chen, C., S. Chen, X. Su and Y. Wang (2004): “Incentives for and Consequences of Initial Voluntary Asset Write-downs in the Emerging Chinese Marke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 3, 543-611.
- Chen, S., Y. Wang and Z. Zhao (2009): “Regulatory Incentives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Asset Impairment Reversals in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 24, 589-620.
- Elliott, J. and J. Hanna (1996): “Repeated Accounting Write-offs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Earn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4, 135-155.
- Elliott, J. and W. Shaw (1988): “Write-offs as Accounting Procedures to Manage Percep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6, 91-119.
- Francis, J., J. Hanna and L. Vincent (1996): “Causes and Effects of Discretionary Asset Write-off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4, 117-134.
- LaFond, R. and R. Watts (2008): “The Information Role of Conservatism”, *Accounting Review*, 83, 447-478.
- Rees, L., S. Gill and R. Gore (1996): “An Investigation of Asset Write-downs and Concurrent Abnormal Accrual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4, 157-169.
- Reidl, E. (2004): “An Examination of Long-lived Asset Impairments”, *Accounting Review*, 179(13), 823-852.
- Strong, J. and J. Meyer(1987): “Asset Write-downs: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Security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e*, 42, 643-661.
- Wilson, G. (1996): “Discussion: Write-offs: Manipulation or Impair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4, 171-177.
- Zhang, R., Z. Lu and K. Ye (2010): “How do Firms React to the Prohibition of Long-lived Asset Impairment Reversal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9, 424-438.
- Zucca, L. and D. Campbell (1992): “A Closer Look at Discretionary Write-downs of Impairment Assets”, *Accounting Horizons*, 6, 30-41.

(责任编辑:周莉萍)